

第一章

一条可怕的小链子改变了我的命运



眼前的一切渐渐地变得模糊，渐渐地变得灰暗，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了彷徨，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疼痛，身体也变得轻飘飘的。我这是在哪？是不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突然又感到害怕，是因为孤单？是因为无助？还是……迷惘中我在急切地寻找，想找到一种可以依赖的力量。但我却不能，因为我无法挣脱那具沉重的身体对我的束缚，任凭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虚脱得不再挣扎了。

有人叫醒了我，打断了我无谓的挣扎，飘渺不定的灵魂被拽回到现实。被褥都被我的汗水潮湿，让我觉得有些冷。护士拔掉了我手背上输液的针。周围好像有好多人。我只睁了一下眼睛，也没看清什么，就又无力地闭上了。隐约感觉屋子里灯光有些暗，有很多人影在晃动。仿佛听见有人在张罗着给我穿衣服，有人在问担架准备好了吗，有人在问车准备好了吗。我已没有精力去询问他们要做什么，只是在换衣服时，那一阵阵来自右腿钻心的、撕裂般的疼痛会让我稍有清醒，并一次次近似哀求地说：轻点啊，再轻点……

不知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乏力，也许是因为没休息好吧。昨天晚上住院时，持续了一天的呕吐始终没停，后来又不不停地打嗝。医院根本不具备治疗这种特殊病症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技术设备，他们能做的只有束手无策。一夜未休息好。今早我不再呕吐了，但那条受辐射最严重的右腿，已经开始红肿、弯曲并伴有疼痛。医生把我由急救室转移到普通病房。这是一间大病房，共有 8 张病床。医护人员刚安排我住下，便有好心人过来问长问短：小伙子是什么病啊？这腿怎么弄的？是工伤吗？……我告诉他们，是我误拾了一条“钥匙链”，后来领导告诉我，这小链子是公司检测所不小心丢失的，叫“伽玛”源，有很强的放射性。

我的一句话激活了整间病房。大家忽地一下聚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听说这东西可厉害呀 就像原子弹 它有辐射呀!”

“是呀 前些年就有一个工人不小心受了辐射 后来就死了!”

“这么有危害的东西怎么能让它轻易丢失呢?”

“……”

大家越说越气愤:

“让他们给转院 这破医院根本治不了!”

“听说这病得换血 让他们管 不管怎么行?!”

“不管就去告他们 和他们打官司!”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说的这些我从未听过,也从未想过。想不到我印象中一条简简单单的小钥匙链竟会带给我这么多后果。什么是辐射?后果到底会怎样?真的会死吗?单位从未做过一次相关的安全教育,哪怕是轻描淡写的一次都没有,我对它的危害更是一无所知。索性我也不去想将要发生的事,确切地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想。

正说着 有领导来探望 大大小小的领导 表情都很严肃,一会相互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一会又煞有介事地聚到走廊里。紧接着就来了若干人,挤满了病房。他们中有的省卫生厅的,有的是省防疫站的,有的是研究所的……不管是哪的,手里都拿着纸笔在做记录,于是我又一遍遍地向他们讲述事发经过,虽然我是那么疲乏,虽然我是那么疼痛,虽然我是那么不情愿。

1996年1月5日早晨7:30 我在上班的途中 在地面的薄雪上拾到了一条类似“钥匙链”的小链子,我问身边的人是否丢了钥匙链,都说没丢。因急于去安排工作,就把钥匙链放在右腿膝部裤袋内,准备中午午休时再寻失主。

大概在上午9:30左右,我突然感到头昏恶心,我以为是重感冒。因高空作业 怕出现危险 便回到工地休息室休息。

大概上午10点左右 我开始呕吐 并越来越频繁。我先以为是食物中毒 但一想从昨晚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又以为自己患了感冒。中午12点左右 我以重感冒为由向领导请了假,获得批准后坐中午送饭的班车回到单位宿舍休息。

回到宿舍后,我脱掉工作服,把它放在床下箱子里。此时呕吐更加频繁,约每一两分钟就吐一次。由于胃内早已无物可吐,我就大量喝水,然后再吐出。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下午5点左右。我整个人都已虚脱了,精神有些恍惚,右腿有麻痛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了,艰难地从六楼宿舍爬到五楼值班室求救。

半小时后 金队长来了。问我怎么了 我说自己得了重感冒 吐了一下午了,请求他送我去医院。就在工友替我穿衣服的时候,金队长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工地的？”

“中午坐送饭的车我向你请的假呀！”

“那你在工地捡没捡到什么球儿啊或链儿啊之类的东西？”队长一边做着手势，一边有些急切地问。

“啊我上午在工地捡到了一条钥匙链还没找到失主。”金队长这么一问，我才想起那条早被我忽略的钥匙链，我以为是金队长丢的呢。

“那链子现在在哪？”队长显得很紧张。

“还在我床底下的工作服口袋里。”

“哎呀！那链子就是研究所昨晚丢的‘伽玛源’！快！马上架着他离开这屋！班长去给经理打电话，说东西找到了！快！”队长十分紧张且焦急地吩咐道。

.....

我不知道自己是被怎样弄到担架上的。只模模糊糊听到有人说：已经晚上11点多了，没有电梯了，走楼梯吧。接着又听到有人在指挥抬担架下楼：前面高点后面低点慢点都看着点.....似乎每下一个台阶右腿都剧烈的痛一下我就会痛苦地呻吟一声。自己怎么上的车也不记得了，大概是辆面包车吧，我躺在最后一排。不停地颠簸不断地加剧着我的痛苦，我毫无睡意。

“有止痛药吗？给我一片止痛药吧！”我的右腿已经痛得伸不开了，仿佛那条筋在一点一点地被割据、被缩短。

“再挺一挺吧马上就到了！”说话的是单位的书记。

“要去哪呀？”我痛苦地问道。真希望马上就到那。感觉到那之后我的痛苦就会消失。

“咱们职工医院治不了这种病，领导要给你换个医院。马上就到了，你再挺一挺。”

车里黑漆漆的。我止住了痛苦的呻吟，但并不是我不痛了。我想用手抓紧某件东西，感觉那样会减轻些痛苦。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左手已经红肿了，变得无力不能伸曲，但奇怪的是并没有疼痛感。我已无暇再去顾及它，用右手紧紧抓住坐垫闭着眼咬着牙忍着痛不吭声任凭痛出一身身的冷汗。

车开了许久，估计应该到目的地了。一想到这，疼痛似乎又在加剧。我想使自己换个姿势也许那样会好受些但我想错了我已没有力气了就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稍微动一动就会带来剧烈的疼痛。我微微地抬起头向车窗外望去。借着窗外微弱的车灯光，我看到一排排树木快速地闪过，车里没有声音，远方也是黑森森的。我开始觉得有些恐怖，很无助。感觉脆弱的自己在与黑暗抗争在挣扎在逃离而那黑暗却是无尽的。

不知道车要开到哪里去，抑或本来就无目的。从时间上算我们离开吉林市已经很久了，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索性就不问。目光漫无目的地投向窗外，思绪万千。医院会治好我的病吗？我会死吗？我的腿还能好吗？还有多久才能到？……就这样胡乱的想着，疼痛似乎稍有减轻，不知不觉我又睡着了。

我醒的时候车已经停了。车内依旧黑漆漆的，不知车里坐着几个人，却都没有下车的意思。我挣扎着问：

“这是哪啊 到医院了吗？”

“这呀 这——这是长春机场。咱这医院条件不好，我们坐早晨的飞机去北京。现在才凌晨两点，再等一会天亮了咱就进去，你再睡一会儿……”

从书记的话中我意识到自己伤得很重，但我却没有惊奇。无论我的伤是重是轻 无论能不能治好 也无论是去哪医治 这些我都不去想 没用。我想的只是尽快结束目前的痛苦，但并没有，疼痛依然在加剧。而且我感到口渴，非常非常的渴，仿佛身体里所有的水分都已被榨干，连一滴唾液都没有留下来。我又渴又痛，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永远只有那一句：再挺一会儿。似乎我所有的要求也只有这么一个答案。

如果用“煎熬”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身心感受，我想一点都不为过。当我终于“挺”过了书记所说的“一会儿”后 已是 5 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

一进入候机厅我就坐在轮椅上了。因为这时我不但全身乏力，而且我的右腿膝部已经变得肿胀并且弯曲了，已经不能行动自如了。我曾试着将腿伸直，但那钻心的疼痛让我不得不放弃，仿佛那条腿从来就没有伸直过。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轮椅，不用自己走，想去哪就让人推去哪，感觉挺新鲜的。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以后那么长的一段日子里，都是轮椅与我为伴度过的。

第一次坐飞机，新鲜感完全被疼痛感所替代。也没有激动，只是坐在那儿不敢动，因为怕疼。自从坐下后右腿就麻了，我就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麻木总比疼痛好受点。我把头靠在窗户上，外面天气很好，少云。我把目光漫无目的地洒下去 有城市、山川、河流、公路 好像还看到了长城 无论什么 似乎都激不起我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我实在没有精力去顾及其他，我只盼早点到北京，我感觉自己实在不能再挺了。北京，这个曾经令我向往的地方，没想到第一次来竟是为了治病 而且是好是坏 是生是死 前途未卜。

蹦下汽车上飞机，下了飞机再蹦上汽车 就这样 我终于在 1996 年 1 月 7 日下午 1 点多，“蹦”到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七医院急诊室。那一刻，我仿佛全身的精力都已耗尽，被压抑了好久好久的神经突然松懈，疲惫、疼痛、无助，瞬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地向我袭来，将我淹没，不留余地。我瘫坐在急

诊室的椅子上。就在我即将沉没的时候，我使劲地摇了摇头，抓住了些许意识，绝不能让它溜走，我要保持清醒的意识。

有护士迎上来，问是怎么回事，书记马上回答是骨折。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书记当时为什么要撒谎。

“我们医院没有骨科，马上送到别的医院吧！”大概是护士也不忍心看到我痛苦的样子，于是焦急地催促道。

“啊，不是的，这个——我们是从东北吉林来的，是跟你们预约的——就是受辐射的那个病人……”书记终于解释清楚了，护士反而更生气：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全院都在焦急地等着这个病人……”护士边说边抓起了电话。

不久，大约有 10 多个人，几乎是用“冲”的速度来到了急诊室，有的穿着笔挺的军装，有的穿着洁白的大褂，有人相互介绍：

“你好，我们是吉林吉化公司的……”

“您好，我是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专家，先把病人送入病房，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研究抢救方案……”

到底是军人！做事有质有量有速度。

医生取来了轮椅，快速地把我向病房推去。边走边问：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疼，特别疼，能给我点止痛药吗？”我说出了我的请求，一个“由来已久”的请求。

“可以，可以！我们院长和专家组一直都在等你，他们连午饭都没顾得吃。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我被安置在二楼阳面靠窗口的一张病床上，之后医生就急匆匆地走了。我还是渴，喝的水似乎已不再被吸收。我想吃梨，水分特多的那种，特别特别想吃。我便让小唐替我去买几个梨，钱先由他垫付。小唐出去后，偌大的一间病房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落日的余晖透过树梢从窗口照进来，应该是温暖的，美好的，可是我却感觉不到。孤独、无助、迷茫，还有病痛笼罩着我。病床是白的，病房也是白的，就连那束阳光也似乎是惨白而无力的。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在变小，整个空间却在变大，变得更加空旷、阴森、恐怖，甚至毫无生机。我感觉自己像被置于无尽的苍穹，又像是被弃于无底的深渊，飘忽不定，无依无靠。我挣扎，我叫喊，却苍白无力……

似乎有什么声音，我从恍惚中醒来。一位女医生推门进来。

“你叫宋学文是吧？”女医生问。

“嗯！”我用鼻音回答她。我积聚了全身的力气也只不过一声轻哼。

“我是内一科的护士长。来 这是止痛药 你把它含在舌头下面 不能咽。”我看到了药盒里的那片药，白色的，只有火柴头儿那么大，这么点儿的药怎么能止住我那么巨大的痛苦？！我不禁有些怀疑。

“给我吃两片吧！”我无力地哀求道。

医生看出了我的心思。“这药非常管用的，含一片就足够了。它是有毒易成瘾的，不能多吃。你先把这个含上，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很困 就不会痛了。”

我只好半信半疑地含下了那据说能止痛的小药片。

“现在院长还有一些专家、教授几十个人正在紧张地研究治疗方案。你要有什么事就按床头的铃，我们会过来的。你先休息一会儿，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会有办法的。”

护士长说得对，我刚含下那片药不到一分钟，那条折腾了我 50 多个小时、现在已经弯曲的右腿终于不痛了，我真有点恨它，但我却没有想过如果失去它我会怎样。疲乏加上药力，我沉沉地睡着了。不知何时，小唐把我叫醒，说找了许多地方也没买到梨。我迷迷糊糊地又嗯了一声，这就是北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没梨。又不知何时，我感觉有人在脱我的衣服。每次碰到我的右腿时，剧烈的疼痛都让我叫出了声。于是有人说：长痛不如短痛，用力一下子脱下来。随着我的一声大叫，我不知自己是昏了还是睡了。又有人扶起我，有人在理我的头发，凉凉的像是在理光头 我无力地挣扎着 我不愿理光头 为什么要理光我的头发 后来好像还给我量了身高和体重。而那药也真是厉害，我出奇的困，两张眼皮就像两扇厚重的大门，怎么睁也睁不开，记忆也是断断续续的。

有种声音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膜，让我醒来。我的意识在捕捉这个声音，渐渐地 我听清了 是水滴声 时而大 时而小 时而急 时而缓 像是来自无底深洞的滴水声。每一声都那么刺耳，那么空旷，却又那么遥远。我慢慢地睁开眼睛，黑糊糊的 像是没开灯。意识渐渐清晰了 眼前景物也渐渐清晰 灰白的天棚 吊着一盏灰白的灯 散发着灰白、暗淡的光。一边是白色的墙，一边是玻璃和门 地上放着一只桶，一个穿着奇特服装、只露着眼睛、不知是男是女的人在桶边拧着毛巾，水滴进桶里，清脆而响亮，这就是那个声音的来源。我弄清了自己的位置，我躺在一张带轮子的平板床上。我扭过头看着那个人。

“你醒了 还疼吗？”听声音是个女孩 只是口音有点怪。后来她才告诉我，那是地道正宗纯正的北京口音。

“……”

“怎么不说话？”她一边小心地给我擦着身体，一边和我说话。我感到莫名其妙。

“.....”

“现在有什么感觉？”

“这药真好使！”我由衷而且深有体会地说。

我被剃光了全身的毛发，洗净每寸肌肤，全身消毒后送入了位于医院五楼的洁净病房。那个护士告诉我：这是医生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因为我的病极其特殊，又怕感染，又怕出血。洁净病房里是一个细菌都没有的，所以也叫无菌室。它原本是专供治疗毫无抵抗力的白血病患者用的，是最好的病房，也是管理最严、价格最贵的病房。

也许是那药的余力还没过，我并不感到很痛，人也显得有几分活力，于是便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我眼中的洁净病房是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一张洁白的床 对面有台电视 电视上面有台监控器。左侧全是玻璃窗，一扇玻璃门外边就是我才消毒的走廊，走廊对面便是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床的右边放着一辆急救推车，上面摆着急救用品。再往右便又是一大扇玻璃窗，透过玻璃窗外空荡荡的走廊，便可以看到外面了。无菌室，一间近似透明的小屋。

刚熟悉完屋内的环境 便有人来 依旧穿着浅绿色的怪衣服 帽子、口罩、手套、袜套，只剩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先是与身边的一个护士小声嘀咕了几句，紧接着转向我 声音也提高了好几度 爽朗 清脆。

“怎么样了，小伙子？不疼了吧？剃了光头比原来精神多了，还不让剃呢！你知道吗，你还没来我们整个医院就忙上了，为了集中力量，我们这科都不收病人了，10间病房就住你一个人！到现在院长和那些专家们还在开会，分配任务和制定紧急救治方案，都两顿饭没吃了。哎呀，多漂亮的小伙子！像人妖似的，你说你没事捡那破东西干吗？那东西怎么能丢呢？你今年多大了？”

终于给我说话的机会了。

“快 20 了 还有——几个月就过生日了。”我想 想说。

“还挺年轻嘛 得了 你以后就叫我‘大妈’吧 我也是东北的 我姓王 是这科的护士长。我嗓门大，但我讲理！一会儿会有医生来，给你做个小手术，打麻药，一点都不疼 别紧张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 身体哪不舒服也及时跟我们说，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治疗！”一接触，我便发现她是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型的人。

我点了点头。

“知道这是谁吗？”大妈指着旁边的护士问我。

我上下左右看了她一遍，摇了摇头：

“不认识.....”

“嗨 我不就是刚才给你消毒的那个小季嘛！”

护士走后不久，来了一高一矮同样穿着的两个医生，于是，我的第一次手术便开始了。手术的目的就是在锁骨处插一根输液管，这样以后输液就不用再重新扎针，极大程度避免了因输液引起的感染。医生开始给我打麻药，当手术刀割开我的皮肉时，我听到了滋滋声，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恐怖。我不知自己是紧张还是害怕，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而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手术，仅仅才是个开始。

夜幕开始降临。在它完全笼罩一切之前，我的目光穿过了大玻璃窗，投向了远方。所谓的远方不过是窗外的另一座楼而已。它矗立在夜色中，虽不高大，但却威严，像座城堡。楼的顶部有一大束天线，那形状就像一棵落光了叶子的秃树，而每根树枝都像一把利剑，似要刺破夜幕，与黑暗相抗争。远处飞来了一群乌鸦，一大群，落在那棵秃树上，那树就像突然长出了许多黑色的大叶子，二者的命运好像被连在了一起。稍作休息后，有的便拍打着翅膀飞向家的方向。于是便想起了那首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起风了，好像还很大，便有乌鸦迎风飞起，但那风却吹得它飘忽不定。凛冽的风撕扯着它凄厉的叫声，任凭它拼命地拍着翅膀，任凭它一次次努力的尝试改变命运。夜色更浓，淹没了抗争的利剑，风也更大，吹散了归家的乌鸦……

有医生急匆匆地跑来问我家庭详细地址，我一愣，全身每根神经都瞬间紧张起来，戒备着。为什么？医生说是病情需要，必须通知家人。我不愿去惊动家人，更不愿家人看到我这样子而伤心。可我又别无选择，我很不情愿地说出了家的地址。家，那是一种多么温暖的感觉，一种多么欣慰的感觉啊！而现在，我却离家千里之遥，形单影只，无奈无助。模模糊糊中，一种想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虽很偏僻，却不闭塞。这就是我的家乡，一座远离都市喧嚣的小山村。15岁时我就离开家去外地读书，之后又去上班。我在不断地接受着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而家乡却依旧用纯朴、热情、温暖的怀抱迎接我的每次归来。而现在，那条弯曲而泥泞的乡间土路，还有那袅袅升起的炊烟，都变成了我思乡的缕缕情思。

那时，我每隔一两个月就回一次家，当双脚一踏上家乡的土地时，那种愉悦的心情是无法言喻的。因为交通不便利，有时我只能在家住一个晚上。但每次回家，无论时间有多紧，我都要去看望奶奶，奶奶就住在隔壁的三叔家。从小奶奶就非常疼我，每次我都陪奶奶聊很长时间，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奶奶上了年纪，耳朵有些聋了，前几年又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失明了，但这却丝毫不影响我和奶奶的交流。我每次来到奶奶跟前，只要把手递给奶奶，奶奶一摸就能亲切地叫出我的乳名来，我也不必大声说话，奶奶却听得一句不落。奶奶除了讲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每次还都给我讲大爷年轻时上学时，因为轻信别人而被骗了财物的

事嘱咐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每次我都认真地听，从不觉得唠叨，奶奶是善良的。每次我要走的时候，奶奶便摸索着拿出她珍藏了许久的糕点和糖果，不容拒绝地塞满我的每一个口袋。这些糖果是奶奶每逢年节时攒下的，虽然有些已经发霉，但我从未嫌弃过，这是奶奶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最后还不忘问我下次回来的日期，之后便默默地数着、盼着。

最近的一次回家是199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我受伤之前一个星期，适逢元旦假期。那天特别冷，但心情特别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爬行，而心似乎早已飞回了家。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下车的，接站的，挤满了不大的车站。借着车内微弱的灯光，透过攒动的人头，我一眼看到了接站的父亲。

父亲站在车门对面的一个雪堆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从车里下来的每一个人，生怕错过一张面孔。天气异常的寒冷，父亲微缩着身体，双手插在衣袖里，两只脚不停地互相磕着来抵御寒冷，而眉毛和发梢上早已挂上了厚厚的一层白霜。

“爸！我叫着跑了过去，心里暖呼呼的。”

一看到我，父亲冻僵的脸上立刻露出欣慰的笑容。

“差点儿没认出来你，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父亲关心地问。

“里面穿着厚毛衣呢，市里那边并不冷。”

“我赶了牛车来，就在那边！路挺滑，小心点儿！”父亲一手接过了我的背包，一手搀扶着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父亲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这次能在家呆几天？”这是父亲最关心的话题。

“两天，我三号就得回去上班，那边工作挺忙。”

“正好明天元旦，明早杀年猪。”父亲显得特别高兴。

“爸，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我估计着你这几天能回来，连接了两天没接着，我猜你今天应该回来了！”听着父亲的话，那一幕幕仿佛便呈现在眼前：父亲终于在焦急和寒冷中盼来了客车，满怀希望地看着每一个从车上下的人，直到最后依然没看到我。于是父亲只有一个人赶着牛车，带着失望的心情，默默地向家走去……每想到这，我便有种想哭的感觉。父亲是个老实人，平日里话也不多，但父亲却把他对家庭和子女的关注与爱，完全融到默默的行动中。

从车站到家还有近十里的路程。我和父亲借着月色，坐着牛车往家赶去，每到转弯处，父亲都要亲自下车去吆喝着牛走正路，却不让我下车，父亲说地上滑，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聊，我告诉父亲我在单位工作很顺心，领导对我也很好，厂庆时我写的文章还得了二等奖呢！而对于我从事的高空作业工作的危险性，我是从不跟家人说的，我怕他们为我担心。父亲没多说什么，但我能感觉父亲心里那份幸福和欣慰。从父亲的话里我也知道奶奶身体很好，母亲时常挂念我，妹妹学

习很用功，今年的收成也很好。母牛又下了一头小牛犊，家里现在一共有 10 头牛了。

家里住的是一座 20 多年前盖的土房，经过历年的风吹雨淋已经显得破旧了，父亲说过几年我工作稳定了就盖新房子。但无论如何，每当我一踏进那扇门，我便被亲情、温暖和爱所包容。那种感觉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给予的。

本来是要在家住两天的，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呼啸的北风吵醒。天阴沉的，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风中乱窜，看样子要下一场大雪。如果大雪封了路，惟一进城的车不通，我就无法在预定的时间赶回去，就会耽误工作。所以，我必须坐当天早晨的客车，在大雪封路前回到单位。我向父母说了我的决定，父母先是一愣，接着失望便写满他们的脸。

“再住一天吧！今天杀猪，吃点儿肉再走……”

“过完节再走吧！今天天又这么冷……”

每一句话里都充满了哀求，每一句哀求都让我心酸，但我实在得赶回去，我是带班的，如果我不按时上班，其他几个人的工作也无法展开。见我执意不肯，父母也不再挽留。这几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难怪母亲有时埋怨我把家当做旅店了，但父母还是理解我的。

我从破旧但却温暖的小屋里走进凛冽刺骨的寒风中，嗖嗖的冷风顺着衣服每条缝隙刺激着我的肌肤，使我更加怀念那小屋的温馨。父母送出了很远，我只自顾自地走着，头也没回。我不敢回头，我不敢看风雪中父母年迈的身影，我不敢看父母那患得患失无奈的表情，我不敢看父母那依依不舍的眼神，更不敢看父母眼角即将流下的泪花，而每一幕都是我不能抗拒的。走出很远，还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殷殷叮嘱；走出很远，还能看到风雪中相偎的身影。我的眼睛也渐渐模糊了……

忘记了第二天是什么时候醒的了，只记得一睁开眼睛就有两种感觉。一种感觉是很热闹。医生护士好像一下子多了好多，大约有七八个护士，却都忙得不可开交，有的换输液瓶，有的在给我抽血，有的在接响个不停的电话，有的在整理医生开的各种检查单据……而窗外也会不时的匆匆来一拨儿人，有穿军装的，也有穿白大褂的。或是大声地同我打声招呼，或是相互小声嘀咕几句，然后再匆匆地离去。病房就像身处闹市的惟一静地，我被一种紧张神秘、令人窒息的感觉所包围，我对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而另一个感觉就是疼。我的病情好像一夜之间加重了许多，两只手都肿得不能动了，特别是左手手心已经起了一个大泡，就像手里抓着一个鸡蛋似的。最疼的还是那条右腿，它已经肿得发亮了，里面的血肉似乎每时每刻都要胀破皮肤，迸将出来。右腿弯曲成 100 度左右，不能曲展，除了难忍的疼痛已没有其他

知觉了，而且小腿外侧还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水灵灵的大泡，医护人员在腿下面小心翼翼地垫了许多柔软的海棉圈。我平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因为每动一下都会带来一阵钻心的痛。右腿上也不敢盖东西，怕磨破。

大妈响亮而独特的声音打破了病房死一般的沉寂。

“怎么样了小伙子！还疼吗？你猜谁来看你了？”我看不到大妈的表情，但隐约能从声音中听出一丝无奈，一丝忧虑。

“不知道！”我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而憔悴。

“你爸妈来了 就在窗外……”

“我爸妈？！他们怎么来了？是谁通知了他们？在哪？不行！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快！快把我腿盖上！”护士刚把我腿盖上，一大群人便出现在窗口。我一眼便看到了家人：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滚烫的泪水一下充满了我的眼睛，我使劲地眨着眼睛，一口一口地吞咽着眼泪，尽量使声音显得平静些。

“爸妈……”泪水又一次向我袭来 我想哭 想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把那压抑了许久的情感统统倾泄出来 但我没有 我不能。我强忍着 抗拒着，一丝苦涩的笑堆积在脸上。

家人面无表情，机械地挪动着脚步，猜测的目光跳跃着，小心地寻找着。当家人终于看到了玻璃窗里躺在病床上的我时，一下子全都愣了。

“小文哪？”妈妈趴在玻璃窗上试探地问 声音颤抖着。

“爸！妈！是我……”我使劲地咬着腮，不敢多说一句话。那句熟悉、亲切的呼唤几乎要击垮我所有的努力。

“你这是怎么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 就在几天前还是又蹦又跳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一转眼就剃光了头躺在千里之外的病床上了呢？眼前的事实是他们不愿看到的，也不愿接受的。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无情地打击着他们，妹妹忧伤地看着我，不知所措。惊异的表情写满了父亲消瘦的脸，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说出话来。只有母亲坚强却哽咽地问道。

“没事儿 只是受了点儿伤 你们不用担心！”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一边说着话，一边故作轻松地活动着右臂，同时把左臂慢慢地、尽量显得自然地枕到手下，不让家人看到那只已经肿得变了形的左手。

窗外除了家人外还有许多医护人员，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相互小声地说着 比画着。有一位 40 岁左右的女护士趴在窗户上冲我慈祥地笑了笑，我也礼貌地笑着点了点头。

“右腿上不是起了个大水泡吗？把单子掀开让我看一下……”

“泡什么泡 哪有泡 滚！”我愤怒地冲她吼着 掩饰着 但还是晚了 家人

的目光已经在盯着我那条盖着单子一动不动的右腿，似乎要看个究竟，又似乎已知道了答案。妹妹再也忍不住，默默地转过身离开了窗口，我看到了妹妹抽搐的背影。母亲流出了眼泪，又快速地擦去了，掩饰着伤心。家人没说什么，也没再问什么，痛苦的沉默。

“爸……”我在努力地找着话题。

“啊？”父亲迟疑地应着，抬手揉了一下鼻子，顺便擦去脸颊上的泪，努力地想挤出一丝笑容，却又去揉了一下鼻子。

我不知怎样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更不知怎样去安慰家人，也不知怎样去安慰自己。我的目光在家人的脸上跳跃着，我不敢凝视他们，我怕我的眼睛会泄漏我所有的秘密。

“别哭！谁都别哭！咱都坚强点！我没事的……”那一刻，我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说出了这番话。那一刻，我只感觉自己有种责任。

短暂却漫长的几分钟之后，家人被医生叫走了，偌大的一个空间便又剩下了孤零零的我。如果说“伤心”“难过”在此之前只是形容词，那么现在，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极度的伤心之后，我出奇的冷静。不管怎样，我不能哭！我必须挺住！如果我倒下了，我的家人也会悲痛欲绝，这个家便会支离破碎……我一定要挺住！亲人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有护士来换液体，一大袋乳白色的液体被挂在窗外走廊里的输液架上。一滴一滴的液体顺着输液管，穿过玻璃窗上的小孔儿，慢慢地流进我的身体。

“输的是什么药啊？”我好奇地问。其实只是想冲淡一下刚才那种感觉而已。

“呦，这孩子，关心的事还挺多！”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大妈来了。

“大妈！”

“哎！”大妈气喘吁吁地应着，像是刚忙完什么。“知道这是什么药吗？这叫‘高蛋白’，是一种高营养的药。你这种病极特殊，一旦被辐射了，身体的免疫力就会急剧降低，血小板、白细胞都会降低，如果身体哪个部位不小心碰破了，出血是很难止住的，很危险的。所以你现在不能吃东西，万一把食道或胃弄破了是很麻烦的，你只能靠输这种液体，每天一大袋，什么营养都不缺了。”

“大妈！为什么叫我的家人来呀？”

“为了治你的病呗！现在你的白细胞还在急剧下降，如果白细胞指数降到零，你就一丁点儿抵抗力都没了，就得给你做‘骨髓移植’手术，恢复你的造血功能，但首先得找到能和你配型的骨髓。医生现在正在化验你家人的骨髓。知道吗？我们整个医院对你都非常重视，已经召回了所有在外出差的相关专家，为救治你做好了一切准备，你就安心养病，配合治疗，懂吗？”

“嗯！”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尽管我不知道那些医疗术语的真正含义和将要发生的事。

天黑之前我又含了一片止痛药。恍惚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昨天那群乌鸦。

记不清是住院后的第几天，《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对这件事进行了采访报道，并刊登在头版的显著位置。

输液、抽血化验、测出入量、杀菌消毒、专家会诊、病情观察等诸多的医疗程序成为每天的主要内容，我机械地接受着这一切。疼痛稍有减轻的时候，思绪便乘机而入，千头万绪。我想到中学时春游爬山的片段，也想到上班时参加的春季长跑越野赛，但想得最多的还是我的家人。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一直都过着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生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几乎被无情的事实击垮。家人是无辜的，他们所承受的已经太多太多，而这痛苦却是我强加给他们的。面对这一切，我应该怎么做？逃避？接受？还是……家人痛苦的表情又一次浮现在眼前……刹那间，我茅塞顿开，被禁锢的思维一下变得轻松了。我想通了，我必须去接受并承受这就属于我的痛苦！我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感到惊讶，但我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命运对我的挑战，我只能去面对——勇敢地面对。

1996年1月9日上午，王主任来到了我的病房。他是担任此次救治任务的专家组的主要负责人。他先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我的病情，然后话题一转：

“小宋，你会下象棋吗？”

“会点儿，但不太多。”

“嗯！那——你知不知道——‘丢车保将’这步棋？”

刹那间，我的神经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一种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我镇定了一下心绪，笑了。

“您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不用拐弯抹角，我能接受得了，我会好好配合你们治疗的。”

王主任看着我，一下愣住了，反倒显得犹豫了。

“您说吧！”

“这两天一直在抽血化验观察病情，从反馈回来的结果看，毒素正在向上蔓延，如果不及时阻止，引起肾脏或其他内脏病变就会危及到生命，所以你的这条右腿恐怕要——”王主任的目光快速地看了一眼我的右腿又落回到我的脸上。

“是要截掉——对吗？”我不知道问出这句话的勇气从何而来，我感觉像是别人问的。王主任看着我没说话。

“截就截吧！大不了变成瘸子。”我出奇的平静，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的反应使王主任又一下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护士站在门边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这只是我们最坏的打算，我们是不会轻易给你截肢的，除非——万不得已，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争取不截！小宋，你的态度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一个好的心态对治疗是很重要的，你能积极地配合治疗，我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保持好心态 别想那么多 待会我再来看你。”

望着王主任急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头脑中思绪万千，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该想什么，又好像是一片空白。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的思维像是麻木了，空洞了，停止了。呆滞的目光不知投向何处。我想哭，我想叫，我更想逃离这一切。怎么了？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的头脑开始混沌，转而整个人好像又一下子轻松了好多，呆呆地躺在那里，不知是木讷，还是平静。护士来到床边，轻轻地替我盖了盖被子，然后又蹲在床边轻轻地为我按摩来减轻我右腿的疼痛，我看见她眼睛还红红的。这几天一直都是她在病房里细心照顾我，因年龄长我几岁 我便叫她刘姐。

家人的身影又轻轻地出现在窗口。短短一夜间，窗里窗外每个人都更加憔悴了。父亲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稀少的头发乱糟糟的，忧伤的表情堆积在脸上，一双颤抖的手无力地扶着窗台，干裂的嘴唇时而抖动一下，似乎想要说什么，却没说出来。母亲和妹妹也消瘦了许多，红肿的眼睛依稀可见泪痕。每个人都想努力地挤出一些笑容，无奈却被不堪承受的伤心所掩盖。我的心便又痛了起来。

“你们——吃饭了吗？我尽量让声音显得平静。

“吃了。”过了一会儿母亲才哽咽着说出两个字“还疼不疼？”

“不疼了 好多了 你们不用担心 没事的。”

我知道家人根本吃不下饭，而家人也知道我还在疼。善意的谎言，只是不想让对方更担心 更难过。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家人的心在滴血。

“手术的事你们——知道了吧？”想了许久 我终于小心地说出了大家都在回避的话题。

沉默被打破了，家人情感的大堤也被冲破。一瞬间，泪水挂满了家人的脸。一滴滴的泪水，一声声的轻泣，我极力地回避着，忍着，我的泪水始终没有流下来。

“医生都跟我们说了……”母亲已泣不成声，成串的眼泪不断地滴落，母亲依然坚强地抬起头，她在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尽量不哭出声来。平日就少言少语的父亲 此时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扶着窗台的手颤抖着 却始终没有松开 只是不停地用力吸着鼻子。妹妹虽然躲到了一边，但我依然听到了她伤心的哭泣声。母亲要去制止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让她哭吧 也许哭出来会好受些。

“别哭 没事的 咱都想开点 做完手术我就好了……”

“嗯！”父母坚强地应着。

每个人都那么伤心痛苦，每个人都想大哭一场，每个人却又不得不坚强。面对人生灾难，我和我的家人表现得都很坚强，并且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若干年后，王主任对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住院时的病情是很危急的，生与死一线间。凭专家的经验，意识到我病情的严重性，院方迅速组织了最强有力的专家抢救小组，夜以继日地研究抢救方案，并同时召来我的家人，为可能涉及到的骨髓移植做准备。我是1月7日住的院 家人是1月8日赶到北京的 他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不敢相信。家人还没有完全接受眼前的事实，紧接着，1月9日便被医生通知：为了保住性命要截掉我的右腿，并建议家人去做我的思想工作。无论如何家人也不能接受这残酷的事实，短时间内接连的沉重打击早已使家人悲痛欲绝，他们更不愿——也没有勇气将这个决定告诉已饱经痛苦折磨的我，只有躲在角落里伤心地哭泣，无声地抗击着命运的不公。最后只好王主任亲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怕我接受不了这个打击，来之前还想了好几种开导方案，但我的配合却令他出乎意料。

几位医生鱼贯进入病房，说要做一下术前准备。我摆摆手，让家人回去休息，我不想让他们看了更伤心。家人相互搀扶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的视线。

医生开始在我右腿大腿中段小心翼翼地画着线，一边用尺子量着，一边小声地研究着 很仔细 也很认真。

“为什么要画线呀？”我很好奇 希望他们发现了新的疗法。

“从画线的部位开始手术截肢。”

医生的话让我不抱任何幻想了。我抬起头，看着洁净的天花板，不禁想起了我的工作——管线安装。每天我都要拿着图纸、尺子，一丝不苟地 就像现在身边的医生一样，小心地在铁管子上量好所需的长度，再画上线，然后截掉。平日里别人配合我一根一根地截管子，今天却是我配合别人截腿，而且还是自己的腿。那么，在我截铁管子的时候，它们疼吗？它们痛苦吗？它们伤心吗？也许吧 我这样想着。

手术定在了第二天上午。紧接着便是术前准备 灌肠、备皮、插导尿管 几乎每一道程序我都问为什么，大妈便详细地告诉我，我也积极地配合。大妈便玩笑地让护士们叫我“宋大爷”！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这么客气。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北京人形容那些絮絮叨叨、问这问那、对什么事都好奇的人。

我几乎是一夜没睡。虽然也吃了止痛药，但就是睡不着。病房里的灯息了，黑暗中我睁着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目光却寻不到一丝依靠。我试着轻轻地动了

一下右腿，依然很痛。我想起来再看它一眼，明天就要被截掉了，真有些舍不得，但我已没有了挣扎的力气。我试着动了动脚趾，一下，两下，三下，……还有知觉传过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相伴了这么多年，陪我爬过山，游过水，跑过，跳过……可明天我就要永远地失去它了，我不敢想像在失去它的日子里我将怎样生活。真的不敢想像。

转念我又想到了此时此刻的家人，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又怎样度过这个不平凡的夜晚？又要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明天的我？他们一定吃不下东西，一定也没有休息，一定在伤心欲绝地哭泣。他们能承受住这种打击吗？能接受得了这个事实吗？这一切来得是这样的突然，每个人都毫无心理准备。而苦难就是这样的。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值班护士小季告诉我王主任的办公室仍亮着灯，与一些刚被电话叫回的专家研究手术方案。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专家建议少截一点，为了以后方便安装假肢；有的专家考虑到核辐射伤害的特殊性，建议多截点。因为在国外曾经有过类似病例：一个小女孩手指不小心被辐射后开始溃烂坏死，医生截去了她的手指，但病情仍在发展，医生又截去了她的手……直到截去了整条胳膊，小女孩共忍受了 11 次手术的痛苦。

“小季，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我没有丝毫睡意。”

“什么事，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帮我写一封信。”

“写信，给谁呀？”小季好奇地问。

“写给一个女孩。”

“女朋友？”

“就算是吧！”

“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呀？”小季有些为难。

“我口述，你执笔。”

“那好吧！”小季准备好了纸笔，“可以开始了，说吧！”

“梅，你好！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远离你的另一个城市了。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一边努力地想着电视里的相关对白，一边控制着即将流出的泪水。“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从此以后你不会再见到我了，你也不用再费力地去找我，就把过去当成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你们感情很深吗？”小季一边做着记录一边搭着话。

“当然！就在我受伤的前几天我还曾特地去看望她。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一年只能见一两面，其余时间就靠书信联系。我走的时候天下着小雪，她一直坚持把我送上车，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但我没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一想到